

近代
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河北人民出版社

下卷

《文史精华》编辑部 编

近代中国社会史料丛书

近代中国烟毒写真

河北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忆四川烟祸.....	谢藻生 (1)
川江烟毒走私见闻.....	陈锦帆 (22)
经营“特业”五年纪略.....	曾俊臣 (41)
西康省雅属的烟祸.....	杨国治 (56)
旧西康烟祸见闻记.....	余彦富 (71)
“烟都”枪声.....	李焜富 (78)
西康烟毒与荣经事变.....	陈耀伦 (34)
西昌鸦片祸害一瞥.....	林如渊 (36)
西昌禁烟琐记	赵乐群 (101)
鸦片烟在成都	廖季威 白景纯 (106)
烟毒弥漫的邛崃	张永春 (113)
判处死刑的大烟案犯漏网记	郁 生 (117)
解放前江津烟毒	邹遂良 (124)
宜宾烟祸纪要	宜宾市政协文史办 (129)
自贡“烟王”	罗双修 (139)
解放前理县的鸦片种植	桑梓侯 (149)
鸦片在简阳的流毒	曹兆姜 (179)
回忆简阳县烟毒调验所	胡道凝 (186)
民国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	米庆云 (190)
宁属禁政见闻	宁文光 (207)
富顺县鸦片流毒与肃清	苏铁生 (212)
綦江禁烟简史	黄资训 (217)
綦江县禁绝鸦片烟毒工作片断	高镇如 (230)

EA35/69

大足县的禁烟	邓治平	王绍武 (235)
民国时期长寿禁烟概况		樊秉权 (245)
蒋介石禁烟的内幕		萧觉天 (249)
贵州烟毒流行情况	谢根梅	孟慰苍 (266)
我贩运“黔土”外销的经过		伍效高 (284)
征收鸦片特税的内幕		伍效高 (297)
安顺“四大号”与大烟		戴子儒 (304)
西南军阀鸦片害民罪行		刘戟门 (316)
黔东南烟毒及解放后的禁烟		王国华 (322)
从种烟到禁烟的亲见亲闻		张兴智 (329)
鸦片流毒云南概述		宋光煮 (337)
云南鸦片统运内幕		施次鲁 (363)
云南制烟贩毒内情		马超群 (371)
安宁烟毒简述		耿开祥 (379)
广南鸦片的产销及危害		戴启林 (382)
镇康、耿马鸦片种禁与缉毒		吴大能 (389)
云南禁烟概况		李子辉 (401)
民国初年云南的禁烟		万揆一 (433)
大理地区禁烟肃毒略述		苏松林 (442)
民国时期腾冲禁烟事略		李家贤 (455)
解放前德宏禁烟小史		刀继纲 (462)
解放初期昆明市禁绝烟毒的运动		黄秉新 (470)
解放前烟毒祸陕概况及其原因		李庆东 (476)
国民党统治时期陕西的所谓禁烟		袁增华 (485)
鸦片的为害与杨虎城禁烟		田毅生 (493)
民国年间紫阳烟政		康少高 (497)
武功县种植鸦片和禁烟概述		彭绍先 (510)

民国时期渭南禁烟概况	宋金喜	(519)
宝鸡禁烟被难记	水玉璞	(523)
甘肃的毒品危害及禁毒活动	刘 敏	(533)
鸦片为祸甘肃的回忆	聂丰年等	(552)
鸦片烟在临夏地区的流毒	王德清 家玉琴	(556)
天水鸦片流毒见闻	窦建孝	(564)
靖远的烟场	张慎微	(573)
陇西种植、吸食、禁止鸦片记述	陈 仁	(579)
文县烟祸	朱凤岐	(586)
宁夏吴灵地区武装走私鸦片的“土客”帮	克 勤	(592)
马鸿逵的“禁烟”	赵晋熙	(598)
马鸿逵的“禁烟”和“缉私队”	马光宗	(608)
民国时期青海禁烟内幕	王剑萍 王中兴	(613)
大烟毒害的人家	张文新	(620)
解放前新疆禁烟情况	刘德贺	(625)
烟毒在吉木萨尔的流行与查禁	邓如新	(631)
奇台鸦片烟毒之禁绝	孙志斌	(636)
后记		(640)

忆四川烟祸

谢藻生

1934年，蒋介石派贺国光率领参谋团入川，指挥四川军事政治，包括禁烟在内。当时我随贺国光为秘书来川，后又随他在重庆行营、成都行辕、西昌行辕和军事委员会，给他当办公室主任。也兼代四川禁烟善后督办，例行文件是我替他代行。现就记忆所及，把四川有关鸦片的所见所闻和自己的亲身经历，简述如下。

四川鸦片，根据我的见闻，1916年后，大概可分三个时期：1917年到1934年，四川由军阀分防割据，是鸦片极盛行时期；1935年到1940年，是国民党所自诩的厉行禁政六年禁绝时期；1940年到1949年，四川烟未禁绝，西康烟又倾入，是鸦片复盛时期。

一、鸦片极盛行时期

四川种烟，在清同治、光绪间，已很普遍。光绪末年，清廷曾下令禁烟，已收相当成效。到1917年护法战争后，防区制盛行，鸦片种、运、售、吸，又复弥漫全省，大小军阀以此作为公开的甚至合法的财政收入。

（一）烟税如毛

这时烟有哪些税呢？我所知道的不完全的种类，有烟苗税、印花税、起运税、落地税、过境税、出售税、内销税、外销税、红灯税、懒税和附加税。

烟苗税，是农民种烟，根据种烟多少所完的税。有的是以窝（棵）数计算，又称烟窝捐。

印花税，就是普通税。购买鸦片，和购买别的东西一样，必须在票据上，贴用政府(?)所印发的印花；不过这种印花，是特别印花，纳税特重。

起运税，是购买鸦片，在起运的地方所应完的税。

落地税，是把鸦片运到出售地方，在出售地方所应完的税。

过境税，就是在经过的地方所应完的税。如由甲防区，贩运鸦片到丙防区去卖，中间经过乙防区，则在甲防区完起运税，在丙防区完落地税，在乙防区完过境税。

出售税，是指坐商而言。只在固定地方买卖鸦片、开设商店，并不向外地贩运的情况下所完的税。

内销税，是贩运鸦片，只在本防区销售，并不运出本防区以外所完的税。

外销税，是贩运出川，分销全国，在四川出口点或宜昌所完的税。

红灯税，就是瘾民吸烟，或设立烟馆，点着红灯，供人吸食，每月所完的税。

附加税，名目很多。如在某个时期，鸦片运到重庆，当时重庆市长潘文华，要附加市政费一成，缴在他私人所开的重庆银行。唐式遵是渝蔺马路工程局长，又要附加建设费一成，缴在他私人所开的建设银行。至于各防区内，除上述各种税外，还有教育附加、民政附加、建设附加等等名目，随大小军阀自订。

懒税，就是强迫农民种烟，农民不种，就胡说农民懒惰加以处罚所完的税。

(二)强迫农民种烟

四川产烟县份，产量多少不一，每年产量从几十担到几万担不

等。产得最多的要数涪陵、丰都、宣汉、古蔺等县。涪陵每年可产 9 万担；丰都每年可产 8 万担；宣汉每年可产 7 万担；古蔺每年可产 5 万担。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记载：“四川全省，在防区制时期，每年烟的产量，是 120 万担到 140 万担”，这个数字，殊足惊人，但这还仅是所谓“官方”数字。

但四川产烟在境内销售的，只有 30%，70% 是运到宜昌、汉口，行销全国。当时全国吸烟的人很多，烟的来源是四川、云南、贵州、陕西、安徽几省种烟供应，而供应最多的要算四川。

烟的品质，川东所产比川西好些。宣汉的南坝场据称产烟最“美”，时人称为南土，可比云南所产的南土。其次是丰都，再次是涪陵、达县，最差是宁属各县所产的烟。

烟苗税的征收，各防区办法不一：有的是以田亩计算，种烟一亩，征税若干；有的是以产烟数量计算，每产烟 10 两，征税若干。但完税都应缴纳实物，以鸦片烟折价，不收现金。因鸦片烟折价，价极便宜，转手过来，便获大利。

各防区对提倡种烟，是想尽一切办法：如农民缺乏的烟种籽，防区愿向别地运来散发；如农民缺少资金，也可贷款，不过利息较高，将来还本之时，本利要以鸦片烟折算。

种烟不是农民所愿意，都是强迫而行。强迫办法，一种是科以懒税；一种是如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则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如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明年一年，应完五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四川田赋，在民国 23 年时，已预征到民国 68 年，预征了 45 年，这也是一个原因。

农民痛苦，无处可申。有的自耕农，把他的田地契约，钉在大门，他本人离家远出，到城市去谋生。参谋团初到川时，曾接到很多农民寄来田地契约，陈述强迫种烟痛苦。这类文件，经过我手的有几百起之多。参谋团把这些契约，列制成表，寄还农民本县，令其县

长,按地址发还给农民,这就叫“官样文章,公事公办”。

本来四川气候温和,土壤肥沃,粮食不感缺乏;但在防区时代,强迫种烟,种粮食的地面减少,食粮不够,各县也因此有饿死的人。

(三)军队运烟与商贩走私

当时四川交通不便,成渝公路尚未通车;川黔、川湘、川鄂、川康、川陕五条公路,还未修筑。四川所产的烟,70%须运到外省销售。川西所产的烟运输出省,必经过川东。由川西运到川东,全凭人力,运费太贵,成本较高,殊不合算,只好多在本地销售,获利不很大,因此川西产烟,不如川东之盛。川东濒近长江,水运便利,易于出口,因之川东产烟特多。

川东运烟多半是军队,因当时四川地方不靖,土匪还多,商人运烟,惟恐遇匪,必须请军队护送,也等于军队运烟。

军队运烟,目的不在赚运费,而是在逃免税收,赚取商人应完税的钱,这实际就是走私,因烟税太重,特别是外销税。四川对外交通,当时只有由水道至宜昌一条路,国民党在宜昌设有一个特税处,专门征收四川出口的烟税。烟税税率,起初是每担征收1200元,后来改为每担征收2000元。军队走私,如每次运出100担,在税率最轻时,即可赚得应完税款12万元;在税率重时,可以赚得应完税款20万元。运烟越多,获利越大。在商人方面,若自己运烟,假若应向宜昌特税处完税1000元时,而由军队包运,则有时只需500元,只有应完税的一半,商人当然乐得而为。所以由重庆至宜昌,军队运烟走私,是很寻常的事。不过必须持有军长或师长的护照,也还需要打通关节,宜昌特税处才不检查,和军队伙分一点私包袱。

当时四川军长、师长在宜昌、沙市、汉口设有办事处的很多。所谓办事处,有些就是运烟机关。由四川往来于湖北办事处的人,络绎不绝,所办何事,不问可知,四川的军官很富,就是这个原因。

军队调防，更是走私的好机会。郭汝栋部由四川调驻湖北黄安、阳新两县。军队所带的烟，除在汉口卖了很多之外，带一部分到黄安、阳新。黄安、阳新，是两个很小县份，一时不能销尽，由军队经手人，串通当地烟商到汉口去，请汉口烟商到黄安、阳新来买。我是黄安县人，亲眼看见这件事情。

郭勋祺(翼之)部由四川调驻沙市，军队携运很多的烟，在沙市减价出售。沙市烟商，有个叫周汝铎的，和我同乡，他买得不少，囤积居奇，发了大财。

范绍增师移驻江陵，其部下团长、营长，随运很多的烟。初到之时，江陵的烟，顿时跌价，一般瘾民，私相庆喜说：“范师长来得好，我们吸点便宜烟。”

除军队运烟外，还有商贩走私。走私商人多半每人资本只几百元，或几千元。每次贩烟，只几百两或几千两。他们惟恐禁烟机关察觉，白天不敢走路，夜间结伴而行，每次十余人或数十人不等。所走地方，是偏僻小路。他们必须联络哥老，结交匪徒，怀带手枪，如遇查缉人员缉捕他们，便开枪与之对抗，有时互有伤亡。这类的人，以在川东与湖北交界地方为最多。

(四)军阀官僚垄断经营

每年新烟上市，涪陵、丰都、古蔺、达县都很繁荣。宣汉的南坝场，是川东烟商集聚之地，更为热闹。这些县份，有些商店专门收买农民的烟，转卖与外来的烟商。有些只代烟商鉴定烟的成色，评定价的高低，代客过秤，从中取点手续费，而自己并不买卖。有些大量收购，囤积居奇，运到别处去售。

四川烟商特别的多，资本大小不一，从几万元到几百万元不等，大的公司商号，多半有银行投资。四川银行，由军人开设的不少，如重庆银行是潘文华的，建设银行是唐式遵的，通惠银行是邓锡侯的，济康银行是刘文辉的，大川银行是杨森、王缙绪的，商业银

行是黄庆云的，益民钱庄是罗君彤的。这些银行，不经营烟的很少。我所知道，只杨灿三的聚兴诚银行不做烟生意。

四川人把曾俊臣叫鸦片大王。曾俊臣，是威远县人，他原来做盐业生意有 30 多年，虽然发了点财，但不算甚富。他与李春江、石竹轩二人，合资 30 万元，做鑫记商号，专门贩烟。他们在四川境内，有四十几县设有分站，在云南、贵州设有分庄，在湖北设有分号。每次贩烟，起码几千担到几万担，获利甚多。后来有些军人，如谢德堪之流，要求参加，他们就把鑫记商号，扩大改为庆康土行，资本定为 200 万元，股东有几十人，由曾俊臣为经理。他们在重庆、万县各大银行，可以信用贷款，每次贷得很多，作为资本购烟囤积。又在产烟各县，以所囤的烟，向当地银行以七折抵押借款，再买现货，辗转购买。四川烟商，以庆康为最大，所囤的烟，以庆康为最多。烟的涨价规律，是每年新烟上市，价值低廉，每担只值一二百元，几个月后必定涨价，涨为每担三四百元或五六百元不等。庆康所囤的烟，都是涨价后出售，获利更多，于是庆康经理有鸦片大王之称。庆康股东人人分钱不少，都发了财，而以曾俊臣为最。

据曾俊臣本人过去和我闲谈他的财产：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做的；川盐、美丰、川康等 11 家银行，他参加入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有田地不少，每年可收几千担租。在旧社会，他确是巨富，但他致富的原因，是做鸦片烟生意（参考曾俊臣所写“经营五年特业纪略”——编者）。

石竹轩，我亦与之相熟。他与曾俊臣两次合伙，做鑫记与庆康，也成巨富。川盐、川康两家银行，是他当经理；很多公司商号，他参加当股东；他在万县原籍，每年可收几千担租，他在重庆南岸建业岗的住宅，名叫石庄，建筑费就花了二十几万元。

王政平，是曾俊臣的徒弟。因曾俊臣贩烟发财，他也随之致富。他与他的江津同乡，伙做亚西银行。亚西银行是以鸦片烟起家。

潘昌猷，是潘文华的弟弟，重庆银行的老板，是贩烟有名的人。他资本雄厚，仗着乃兄势力，有政治背景。他的作法与庆康略有不同，他与杜月笙专门贩烟到广东、福建去售，是庆康所做不到的。

湖北黄州，在四川做生意的人特多，四川人称他们为黄帮。他们先是由湖北贩运棉花来卖，又把四川鸦片运到湖北，一来一往，都很赚钱。后来觉得烟的利息奇大，就着重贩烟。在前清末叶及民国初年，在重庆千厮门、水巷子、姚家巷一带，他们有 120 多家商店，专门贩烟。他们组织一个同乡会，名叫齐安堂（齐安二字是黄州的古名）。他们运来棉花，从售价中抽点作为同乡会金。运下去的烟，也抽点作为同乡会金。特别是烟的利润很大，运的数量很多，抽收的同乡会金也就不少。于是逐年以齐安堂名义，在重庆南岸购地皮，生意逐年发达，地皮逐年增多。南岸自龙门浩起，直抵老君洞，左至下浩，右至敦厚下段，包括上新街、前驱路桂花园全部在内，都是齐安堂地皮。这些地皮，在抗战期间租与人家兴建房屋，只收点地皮租金。每年所收租金，数目很大，过去徐源泉在南岸所办私立英才中学校，一切经费，是靠黄帮地皮租金。这样大的财产，2/3 是商人贩烟所获利润，抽收一点积累得来。四川产烟之盛可见一斑。

湖北巨富程海门、程栋臣叔侄，在四川做烟生意多年。先在古蔺、丰都开设永福庆字号，后在涪陵开设谦吉庆字号，专门贩烟，大量运到汉口、上海，是汉口、上海有名的烟商。他们在汉口，置有房屋，在上海、香港，也有很多不动产。巍立于武昌江边的第一纺纱厂，是他们做的。他们的资产是在四川做烟生意赚来。

（五）烟馆林立

四川因吸烟人多，烟馆林立。全省各县各乡，每个极小角落，即使没有旅栈、没有饭店的地方，也有烟馆。如外地旅客到偏僻乡间，夜间找不到旅栈时，可找烟馆借宿；白天找不到饭店时，可找烟馆

商量吃饭；可见四川烟馆，比旅栈饭店还多。

参谋团初到四川时，刘湘的第二十一军有个政务处，处长是甘绩鏞，副处长是陈志学，内有一个科长叫王锡圭，主办禁烟事务。他因禁烟问题常来和我联系，他描写四川烟馆和瘾民的情形，编有一篇短文，念给我听，记得起头两句，其第一句是“十室之邑，必有烟馆”；第二句是“三人行，必有瘾者”。

城市每一条街，即有几家烟馆。有些烟馆外面，写着“雅室”二字，大烟馆内部，陈设富丽堂皇，有沙发躺椅，并备有妙龄女郎，替客烧烟。吸烟的人，喜吃糖食水果，烟馆附设有小卖部。

烟馆要完两种税，一种是销售税，一种是红灯税。销售税，就是把生烟煮成熟膏，出卖熟膏，供人买回家去，不在烟馆内吸所完的税。红灯税，是在烟馆内点着红灯吸烟所完的税。销售税是按每月出售熟膏多少计算，每两熟膏应完的税是每两生烟应完税的一倍；红灯税是按床位多少计算，每一床位点一红灯，每盏红灯每月应完的税，是每个瘾民每月应完税的二倍；每两生烟及每个瘾民，每月应完税若干，是随时规定而不是固定的。

除烟馆而外，还有其他行业，兼做烟馆生意：

(1)旅馆因往来旅客吸烟的多，为便利旅客起见，在旅馆内附设有烟馆，重庆龙王庙的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做的。

刘显卿，善于交际，在他旅馆吸烟的人，多半是资本家、政客、军人。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都有几个房间专门卖烟。四川的旅馆，不附开烟馆的很少。

(2)浴室是专供人沐浴，但亦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上面，有个“其春”浴室，是重庆高级浴室，设有一个房间，供客人浴罢吸烟，不过在这里吸烟比在普通烟馆吸烟略贵一点。

(3)妓院招待来客，除纸烟外，必摆烟灯，这是全国皆然，四川也不例外，实等于妓院附设烟馆。

(4)山货、药材、棉纱、匹头等各行各业，都有他们的交易所，交

易所内附设有烟馆。做这些生意的人，每天必到交易所去，他们的生意，或买或卖，讨价还价，多半是在烟灯盘上做成的。

(5)走重庆到泸州、叙府的轮船，船上茶房附设烟馆，特别是由重庆到宜昌，因当时帝国主义在我内河航行，美国的大来公司，英国的怡和、太古两公司，日本的日清公司，都有些船航行这条河道，旅客上船之后，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船开航时，满船旅客，都在吞云吐雾，如在五里雾中。

(6)还有流动烟馆。所谓流动烟馆就是它没有固定地方，是流动的。万县以下，沿江地方，拉民船走上水的劳动人民，多数吸烟，当上滩要使用气力之时，在上滩地方的沙岸上，有人摆着烟膏器具，供人吸用。这类人，沿江行走，是流动的。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这样事情。

(7)最奇怪者，峨眉山上，亦有和尚卖烟。据重庆青年会副总干事高尚律谈，过去青年会每隔一二年，即组织夏季峨眉旅行团，到峨眉避暑，由他任团长，每次旅客有三四十人。峨眉山上，峻岭丛山，攀登不易，有很多劳动人民，在山中专做抬人游山工作。这些劳动人民，平时多半吸烟，在悬崖险径地方，要使用气力，常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供人吸食。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烟馆。

(六)瘾民占人口 1/19

在四川吸食鸦片，是很普通的事，有瘾者无论矣，无瘾者，也把烟当成应酬品，任何人家，每有客来，必摆灯盘，以烟敬客，有似今天以纸烟待客一样。如客来不摆灯盘，好像醴酒不设，待客之意不恭。

居民之中，有全家人口都吸烟的。1934年，我初到重庆时，家住白象街，我家隔壁，住着一位律师，名叫吴学礼，他家有父母和他夫妇及一个舅爷，一共5人，都有烟癖，每日上午11点钟，还未起

来。段牌坊临江小学校长刘锡安，与他同院，戏写打油诗说道：“律师吴学礼，日高犹未起，川膏与云膏，一天几两几？”又有一首说道：“一家五个人，个个点烟灯，神仙吹玉笛，香雾帐中腾。”听说全家吸烟的事，在四川是很寻常的。

因一时风气，吸烟人多，竟有地方资产阶级的家长，引诱他的子弟吸烟。汪云松住他亲家胡敬六家绣壁街 550 号时，常和我来往。胡敬六是重庆有名地主，每年可收 7000 担租，他仅有一个儿子，名叫胡静云，是汪云松的女婿。地主对自己的独子，当然是十分宠爱，惟恐他的儿子在外面嫖，损害身体；在外面赌，输耗多金，只希望他的儿子终日不出大门，在家守着，以为鸦片烟可以羁縻住人。胡敬六于是千方百计，串通他的亲戚族人，引诱他的儿子吸烟，希望成瘾，而他的儿子，却还有认识，始终没有上瘾。在他看来，这是不肖之子呢！

重庆麦子市居民杨少武，也曾对我谈过：他自幼时，他的父亲希望他吸烟，托人引诱，如能成瘾，情愿予以报酬。杨少武的父亲，是重庆有名地主，希望他的儿子吸烟，用意是和胡敬六一样。旧时代真是千方百计要把人变成鬼！

四川瘾民，究有多少呢？据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文件上记载，四川瘾民，在防区时期，约占全省人口 1/19。四川人口 6000 多万，全省瘾民，至少有 310 万人之多，真可谓鸦片世界。

二、所谓厉行禁政时期

1935 年，蒋介石发表刘湘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兼绥靖主任，同时军事委员会又通令四川各军定期取消防区，防区的行政权交给省政府；各军军长概归绥靖主任指挥；各军经费，每月由参谋团发交绥靖公署，各军迳向绥靖公署具领。蒋介石抓住刘湘来直接控制四川的这一套办法，打破了四川的防区制，也为禁烟创造了有利条

件，堵住了大小军阀“依靠烟捐弥补军费”的借口。刘湘因召集各防区将领，开禁烟会议，参谋团派第二处处长王又庸参加。会议决定：“各军不再在地方提倡种烟。关于禁烟事务，由四川省政府统一负责，拟具办法施行。”接着，拟具四川禁烟六年禁绝计划，呈重庆行营修正，令准施行。

六年禁绝计划是自 1935 年起，至 1940 年止，在六年之中，把烟完全禁绝。

1938 年，刘湘死后，由王缙绪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由财政部委派张静愚为四川禁烟署长。

1939 年，蒋介石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由秘书长贺国光代行。把四川禁烟公署改为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蒋兼督办（贺代行），徐孝刚为会办。把原来的禁烟公署，加上“善后”二字，表示四川禁烟已经禁绝，只须办理善后了。

1940 年，张群为四川省政府主席，又把四川禁烟善后督办公署，改为四川禁烟善后督理处，由四川省政府委员吴景伯为处长。这一改变更是有意识地表示四川烟已禁绝了。

单从以上这些机构的变更频繁，好像煞有介事的是在厉行禁烟，而且真是已经禁绝。现在试看一看究竟是怎样：

（一）官文书中的四年禁种成绩

六年禁绝计划，是着重禁种。把四川全省 148 县，分为禁种县份，和暂种县份两类。自 1935 年，即六年禁绝计划的第一年，限令 138 县，不准种烟，为禁种县份。只指令长寿、宣汉、邻水、大竹、丰都、涪陵、垫江、开江、开县、梁山（梁平）10 县种烟，为暂种县份。这些暂种县份，以后每过一年，即减少 2 县。到第二年，只准 8 县种烟。第三年，只准 6 县种烟。第四年，只准 4 县种烟。第五年，只准 2 县种烟。第六年完全禁种，这是六年禁绝计划。

在禁种县份，普遍成立铲烟大队，做铲除烟苗工作，以各县县

长为铲烟大队队长，各乡长、镇长为铲烟分队队长。严飭各县县长，亲赴各地做督铲工作。

有些偏远县份，土豪劣绅，狃于过去种烟所获，利益巨大，他们抗铲，仍然种烟。有些铲烟委员受人贿赂，见烟不铲，妄报已经铲除。这类事情，在禁种初期，屡闻不鲜。

刘湘调参谋团第二处处长王又庸为四川民政厅长负禁烟责任。因王又庸过去在南昌行营曾任禁烟组长，办过禁烟事情。又因暂种十县，均在川东，再调参谋团组长程懋型为万县行政督察专员，办理川东禁烟工作。

1936年，即六年禁烟的第二年，四川省政府把铲烟工作作为对各县县长考绩的第一标准，令飭全省18个行政督察专员，切实遵行。在这一年，有几个县长，铲烟不力，因而撤差。

1937年，四川省政府，修改六年禁烟计划。缩短两年，改为四年禁绝。即到1939年，全省不准种烟。

烟的产量，据报已逐渐下降。1935年表面上只10县种烟，表报数字为产烟38万担；1936年，8县种烟，产烟31万担；1937年，6县种烟，产烟26万担；1938年，4县种烟，产烟22万担，其中涪陵一县，据报为7万担。

到1939年，便全省不准种烟，自然便无产烟数字。

(二)军阀官僚垄断运售

自1935年起，禁止在大街繁荣地方，开设售烟商店，只准在僻街小巷营业；后来管理渐严，逐渐减少发给售烟营业执照，凡是没领执照的人一律不准营业。因为售烟商店只能售卖政府发给的“官土”，不能偷卖“私土”，要有执照，才便稽查。这是一种垄断。

六年禁绝计划开始，四川省政府训令禁种各县，举办烟土登记，把过去所存烟土，登记起来。如须运出本县时，必要有登记处的许可证，才可放行。这又是一种垄断。